

# 社会公正与和谐之治

陈立平

(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 公正与和谐自古就是相伴随而存在的统一体。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无不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学者对“和谐”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与体认。当下,构建社会和谐已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社会公正理论及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以促成我国的和谐之治。

**[关键词]** 社会公正;和谐之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0]03—0161—04

## 一、社会公正的本体论意蕴

社会公正是中外思想家一直探寻的重要社会问题。西方社会的公正思想肇始于古希腊,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论道:“在哲学开始以前,希腊人就对宇宙有了一种理论,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有着他的或它的规定地位与规定职务,但是凡有生气的地方,便有一种趋势要突破正义的界限,因此就产生了斗争。有一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克的法则在惩罚着放肆,并且不断地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种种永恒秩序。”<sup>①</sup>最早从理论上对公正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当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认为公正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公正是顺从必然;其次,公正表征着义务的忠实履行,服从城邦的利益。柏拉图认为美德就是和谐,公正是诸德的统领。亚里士多德更是把公正看作是各种美德的总汇、总体,各种德行均可囊括在公正的范畴之中。古罗马出现的怀疑主义尽管反对古希腊自然主义的正义论,但他们的观点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公正的认识。他们认为:正义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社会的产物,正义的根据不是自然的而是实用的,人们是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渴求正义,正义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现实。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公正。自由、平等与权利成为正义理论的中心命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契约论为代表的社会公正论。契约论的创立者英国政治家霍布斯认为:在社会状态之前,人类经历了自然状态的阶段。这一阶段,依利己本性行事的人们将自己投入到“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斗争中,为了避免血腥场景的反复出现,在自然法的启示下,人们制定了体现正义、有利于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契约。洛克同意“自然状态说”,但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恶的,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并不必然构成对他人的伤害,而是有可能形成和平、友善、自由平等的关系。契约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则将契约论的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自由。”<sup>②</sup>卢梭主张每个人都应该通过缔结契约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由公意统治的政治国家和社会。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诸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把社会公正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目标,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思想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收稿日期:2009-12-15

作者简介:陈立平,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①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现代学者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制度中的首要价值;哈耶克和诺齐克认为公正的集中体现在于给每个人在市场竞争中以自由选择的机会。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西方公正理论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演变。

我国有关社会公正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体现出孔子对公平、均等美好愿望的追求。董仲舒提醒圣者应“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匀之”。王安石将抑制豪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变法的中心。到了近代,“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成为社会之愿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倡均贫富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当下社会“共同富裕”的构想是中国人民对社会公正的现代诠释。

从公正理论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公正是一个社会价值范畴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它“是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对社会成员之权利和义务的恰当分配”。<sup>①</sup>公正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尺。实践证明,社会越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越发达,其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规定着社会分工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是社会公正的实质要义。同时,公正又是一个社会意识范畴,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和评价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利益各方对利益分配方式的主观评价必须符合一定社会制度下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公正的本质属性要求:(1)在社会经济学上强调公平与均衡,公正不仅要求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充分保障人的劳动权利,而且要求在分配方面将付出与回报相结合,做到起点公正与过程公正;(2)在政治学上强调正义与平等,合理地配置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它一方面要求社会法律制度 and 政治决策是公正的,执行法律制度和政治决策的程序也是公正的,另一方面要求全体公民都有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3)在伦理学上强调合乎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任何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不能侵占他人的自由。当然,公正是相对的,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完全的公正,而只能达到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正。如在经济方面,完全、绝对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对这种相对性表现出容忍,而不是偏执地追求。

## 二、公正之于社会和谐的价值和意义

在西方,最早提出“和谐”的是毕达格拉斯,他提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将“和谐”概念首先引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从社会政权配置的角度阐述了“和谐”思想,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以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sup>②</sup>柏拉图指出了公正与和谐的关系,提出“公正即和谐”。法国傅立叶与德国魏特分别著有《全世界的和谐》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提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制度”将促使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于是,和谐便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保障,这就是社会公正。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易传》中的“太和”观念是中国和谐思想的最早记载。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理想追求和最佳的整体状态。《左传》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进一步丰富了“和谐”的内涵,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关于和谐产生的机制,老子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产生的状态:“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sup>③</sup>《礼记·礼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sup>④</sup>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虽然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和谐公正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社会礼仪与社会规范就是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

①程立显:《伦理学与社会公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②吴兰丽、田伟宏:《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肖苇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④陈成国:《点校·礼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68页。

“仁”是人们自我完善的内在诉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sup>①</sup>在这里，孔子指出“礼”是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但孔子更强调“和”的思想。要达到“和”的境界必须靠“礼”来均衡。礼是实践的主要载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sup>②</sup>孝悌之礼是家庭伦理与治国学说的结合体。通过“礼”的社会教化促成社会整合，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促成社会和谐与公正的重要基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当前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界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阐述了和谐的现代内涵。首先，和谐具有系统协调性，和谐社会是一个由无数个部分所组成的系统，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协调是和谐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系统内的各要素整体优化、统一协调，社会才能良性运行与发展；其次，和谐社会要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保障，其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既能够保障以“生态—经济—社会”为要素的复合系统的全面协调，又能为未来社会多要素、多结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再次，和谐孕育着人本性特征，让每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是和谐的根本特征之一。从抽象的角度看，人本性总括了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把社会公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应当承认，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我国的社会发展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之于社会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质。和谐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不是社会个体的平均发展，利益差别原则和以利益需求调节人们的积极性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现阶段，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严重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为此，要正确引导社会成员的财富观，通过制度设计强化机会均等，从财富获取的正义性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领域的原罪性。（2）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行为准则，人们对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在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型和谐关系下，更需要以公正的价值取向为引导。（3）公正是构建和谐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将公正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促使社会发展达到公平和效率的协同与契合。

### 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和谐之治

当下，社会各层面出现诸多不和谐音。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数以亿计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以及城市失业人口等在内的弱势群体，他们或赤贫或面临生存的危机，由他们所构筑的社会“金字塔”底无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社会对他们应该给予重点照顾。其次，在经济领域，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差异、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行业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可能超过社会公正所能允许的范围。就贫富悬殊而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逐年攀升，一般而言，基尼系数小于0.2表明贫富均匀，大于0.6则表明社会贫富极度不均。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已突破0.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更是超过0.5，这表明我国已经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再次，在政治领域层面，由于受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影响，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还未形成。城乡歧视、贫富歧视、性别歧视和行业歧视在我国还十分普遍，这些都是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此外，各种体制性壁垒已事实上赋予一些社会集团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运转机制。最后，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观并未得到真正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义是自由主体在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与效率的最大发挥。市场从不保证结果的平等但却无比珍视机会的均等，只有这样，人们的社会地位才能由先赋性向自赋性转变，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多的对公正的感知和体认。事实上，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机会不公平还很突出，这是对社会和谐的重要考验。

依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利益分配是社会公正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不公正的出现将从深层次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政治经济学视域看，我国社会的诸多不公正现象主

①钱穆：《论语新解·学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页。

②钱穆：《论语新解·学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公正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社会公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不公是人类为发展生产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一个社会走向新阶段的必经阶段,然而人们的能动性可以减少这种代价。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僵化地对待这个矛盾,必然会进一步加深社会不公。其次,不公正现象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市场经济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促社会公正的实现,但市场经济奉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理念,这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再次,社会制度的缺失。社会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制度具有本源性与道德伦理性,要实现社会正义就得正本清源,正如彭定光在其《论制度正义的两个层次》一文中所指出的:制度正义是人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与制度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道德关注和伦理思考。我国大量的社会不公是与诸如市场竞争制度、社会平等制度以及公民利益表达制度的缺失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利益表达制度的缺失,会加深公民的不公正感及受辱感,离散和谐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促进社会公正,促成国家社会的和谐之治。(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其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科学地回答了“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社会公正正是其博大思想内涵的应有之义。以人为本是社会公正的最高准则,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公正的最高目标,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则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代际公正。因此,社会公正和科学发展观是彼此联系、相伴相生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将促进我国社会的公正。(2)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必须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形转变,即以中产阶级为主导,让更多的人在“小康”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其社会矛盾也相对缓和;此外,为优化社会结构,我们还应设法缩小利益差距,因为正是人们的收入差距才会出现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化,尽管适度的利益差别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但过度的利益分化将会严重挫伤社会成员积极性,甚至导致社会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因此必须完善立法,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与犯罪,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3)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制度。针对我国当前的诸多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只有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从制度设置和制度创新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情,甚至会走向反面。”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种制度越是公正,就越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遵循,从而越有利于人们产生合理预期,避免和限制社会交往中的机会主义动机和短视行为,减少和缓解个人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当下我国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利益表达制度等基本制度亟待完备与完善。可以断言,我国社会公正的建设必须与公正的制度相联系,并以公正的制度为利器,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有序和持续繁荣。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